

家门口“创赢”，营之有道



近来,为深入探索社区创业与居民生活的融合模式,一些街道群策群力、集思广益,希望能够放大有利因素、解决或规避不利因素,为居民社区创业发展提供新思路、新路径。

这些家门口的创业,与此前广义上的创业行为相比,有何不同,具有哪些新特点?它们需要被看见、被扶持吗?

带着上述问题,记者走访了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钟晓华。



普陀区长寿路街道通过举办“苏河共治·船上议事厅”社会组织专场,热议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新课题,推动议事成果转化,协助构建社会组织联盟,对接政府资源与政策支持。图为议事会现场。

嗨,创业者!我是星小创,您的创业AI咨询师~找补贴、查条件、解难题,做您最懂政策的“创业搭子”!

星海立方·众创空间推出AI创业咨询师,希望通过人工智能技术,为创业者精准匹配各级产业政策,提供“滴灌式”服务。

“创赢”之道 将在持续探索中日益清晰

城市周刊:如何打通让政策落地的“最后一公里”,可否请您提一些建议?

钟晓华:我们在调研中发现,推动或者说支持创业项目在家门口落地,扎根,其实有不少政策、资源本来就有,就看街镇层面能不能对相关资源做一个有效的集成,并对其进行比较有效的宣传和贯彻。

比如,在市级层面,通过“乐业上海+”行动、创业见习补贴、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等政策,支持社区创业。在区级层面,以浦东新区为例,明确设立创业带动就业相关补贴措施,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可申请获得场地、融资、税收优惠、社保补贴、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扶持。类似这种举措,集成好的政策很重要,如何及时、精准地把它们推荐给创业者个人或群体也很重要。

除此之外,“微创投”也是不错的支持手段。在我们到访的街道中,有些已经从仅提供非资金渠道支持,发展为建立“轻量化公益创投”,联动政府、在地组织及企业,面向早期优质社创项目提供一定金额的“种子资金”;有些微创投项目已经可以通过街道这个平台,对接助创基金、一些企业创办的公益基金会等外部资源。

除了给资金,还可以给场景、给亮相和试错的机会,这一支持特别适用于那些嵌入社区、街区、乡村的轻量级服务创业形态。

在市中心,愚园路、巨鹿路等通过提供空间开设“快闪店”,为青年创业者免费提供为期7至20天的可用空间。浦东张江镇推出三大OPC(一人公司)项目,在产业园区、人才公寓和美丽乡村分别推出不少于4000平方米的创业空间和500套居住空间,满足不同创业者的多样化需求。

普陀区推出“社区小事空间”计划,联动20余位小店主理人,让小店成为社区议题的传播端口。黄浦区已落地203个“零距离家园”小站,并推出与之相配套的“交个‘站友’”行动者计划,通过课程、项目与生态赋能,筛选、培养小店主理人。

类似举措的推出,无疑为承接家门口创业项目、营造更好的家门口创业生态,创造了更好的条件。这些尝试虽然都还不成熟,有的可能还在对接真实需求的过程中,但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与完善,会在针对性、有效性、持续性上皆有提升。

这让我联想到,如今已成为上海旅游胜地的田子坊,早年也曾是靠居民自发的创业行为,走出了一片天。联合国人居署曾将其定义为“自下而上的旧城更新与社区包容性创业的案例”。当时不少具有突破性、灵活性的做法也是经过一步步尝试,才成为更系统化的制度设计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今天家门口的创业者们的“创赢”之道,也会在持续探索的过程中日益清晰。

本报记者 柳森

创业孵化的载体和阵地有了新变化

城市周刊:早在读博期间,您就开始深入研究以田子坊为代表的上海市民家门口创业现象,此后与城市社会学结下不解之缘。去年秋天以来,您又对上海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、深入探索社区创业与居民生活的融合模式的街道,进行了实地调研。有什么新的发现吗?

钟晓华:其实,在上海,“家门口创业”并非新现象,且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地被重塑。卢汉超曾在

《霓虹灯外》中指出,上海城市运行长期依赖嵌入日常生活空间的小规模经济活动,里弄小巷“前店后宅”“下店上宅”的空间形态不仅是近代上海“五方杂处”的微观实践,也构成了城市现代性的基础。

2016年,我有幸参与了多个全球城市研究团队合作的《全球城市,地方商街》研究。全球化的宏大议程在小尺度街区中得到具象呈现;既有因为在产业转型压力下催生创意经济聚落而红极一时的田子坊,也有在20世纪80年代建成的居住小区中破墙形成的小商业街,承载了快速城市化时期形成的、与混合经济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网络。

相比之下,近年来形成的这一发展趋势可概括为“社治+社创”。其在

延续“家门口创业”传统的同时,呈现出更强的组织化与制度化特征。

例如,在快速城市化早期形成的大型居住社区中,基层治理逐步从单一的社区管理转向对就业与发展需求的回应。一些街道在最初仅尝试整合零散个体经营与社区生活关系的基础上,逐渐意识到居民中潜在的创业意愿与发展动能,进而通过组织化方式加以引导与支持,形成面向社区内部的创业培育机制。

类似的,在新城发展区域,一些以人才导入为特征的社区,通过搭建初孵化平台,尝试将原本分散的青年创业行为,整合至具有一定规模与持续性的实践场域,政社合作搭建了“家门口创业”的孵化平台。

而在园区、楼宇集中的中心城区,社区工作者则尝试通过议事机制与联盟化运作,将社区治理议题与就业、创业等发展议题相结合,在协商与共治过程中探索资源对接与政策转化的路径。

随着调研的街道越来越多,我们发现,尽管不同街道在资源禀赋上有差异,但上海当下的“家门口创业”现象近期已经呈现出三大新变化——

创业落脚点愈发明确、清晰,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“园区”“楼宇”创业,“家门口”的创业者更青睐闲置商铺、小区公共空间、党群服务中心等。由此,这些空间背后的运营主体和管理主体,如街道、镇、社区居委等,天然地和创业者、创业社群产生了联系。

创业主体从“专业创业者”走向全年龄段的“普通人”。不仅全职妈妈、退休人员、自由职业者等多元群体纷纷加入,不少尝试创办“一人公司”的年轻人,也把家门口选作事业启航地。

创业形态从“单一开店”走向“多点开花”“生态共创”,社群运营、数字赋能、城乡联动等新模式不断涌现。

社区创业深植社区场景 与社会需求高度适配

城市周刊:也就是说,大家在家门口创业,不只是为了找一个门槛、成本更低的落脚点。

钟晓华:没错。更多是自己的创业项目,在家门口有了马上可以转换、落地的可能,或者恰好和家门口的社会需求、商业机会匹配了起来。这让近期比较热门的几条产业赛道,如AI数字人应用、宠物经济、新媒体运营、互联网营销、银发经济等,也在家门口多有体现。

如此一来,作为研究者,原先我们可能更多是在“寻找”,想看到到底是哪些人在家门口创业,后来发现,其实所有人都有可能在家门口创业,在家门口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机会。

作进一步的调研后,我们又发现,

当前家门口的创业深植社区场景,与社会需求高度适配,因而具有黏性高、柔性足、韧性强的特点。

这里说的“黏性”来自社区创业项目的内生性,因而在社区内部就能完成项目链条的搭建,形成较完整的生态。

对社区创业者来说,他们从产生一个想法到把这个想法落地,如果在一个大厂或者在一个历史积淀深厚的行业,往往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但如果是在社区里,他们在项目萌发的“起点”就有可能得到鼓励,甚至得到街道、社会组织、社群小伙伴等的支持。而且,在社区里,从发现问题到定位需求、从找到需求到孵化项目,再从孵化项目到变成生意,要走完这样一条完整链路所需要的时间是比较短的。

“灵性”的“灵”既可以体现为“灵活”,又可以体现为“零碎”“分散”。对于社区创业主体而言,不仅时间是灵活的,工作状态是灵活的,劳动关系也可以是灵活的,可以有本职,也可以做“斜杠”,为“进可攻退可守”提供了空间。近来,“一人公司”这种形态为何较多地出现在街镇层面,而不一定适合到一些规模较大的园区或楼宇里去推广,和大家对灵活性的渴望无不关系。

“韧性”是时代发展大势下社会个体在独立性变强的产物。在走访中,我们时常听到社区创业者表达了对“怎样去拥抱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挑战、不确定性和风险”等问题的关切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载体和末端。从这个角度而言,社区能否给予创业者一些托底性、分层化、定制化的支持,是很有必要且值得深入探索的。

毕竟,不同社区有不同的特点和资源禀赋,创业项目所需支持也会因其发展阶段不同而产生变化,为此,街道层面提供的支持可以做精做细,如分为托底型、普惠型、进阶型等。在一些对家门口创业现象比较重视、主动作为的街镇,已经从一开始的研究政策的可及性,发展到了讨论怎样让政策更好用、如何打通让政策落地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

联合国人居署曾将田子坊定义为“自下而上的旧城更新与社区包容性创业的案例”。图为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前夕,田子坊陆续完成“门户焕新、弄堂织景、艺术融合”三重改造,为老弄堂换上“花衣”。 均 资料图片



哎哟不怕

幽门螺杆菌,不必“见菌就杀”

本报记者 陈俊珺

幽门螺杆菌,一种近年来频繁进入大众视野的细菌。体检报告上一旦出现幽门螺杆菌“阳性”二字,就会不少人陷入恐慌,以为患上胃癌不远了。

事实上,幽门螺杆菌感染并不需要“见菌必杀”,它的致病性、治疗必要性都需理性看待。

是否致癌,要看毒力分型

幽门螺杆菌是一种能在人体胃内强酸环境中生存的细菌。全球约有一半人口受其感染,我国的感染率约为44.2%,农村地区高于城市。这种细菌主要通过口-口、粪-口传播。日常生活中的共餐、口对口喂食、共用个人物品等行为,都可能成为其传播的途径,

因此具有比较明显的家族聚集性。

很多人误以为,只要感染了幽门螺杆菌,就迟早会得胃癌。上海市普陀区中医医院内科主任章鸣鸣告诉记者:幽门螺杆菌的致病性,取决于菌株的毒力因子,CagA和VacA是关键指标。只有高毒力菌株才会损伤胃黏膜,引发炎症、溃疡,甚至增加胃癌风险。而低毒力菌株通常只会导致轻微的胃炎,甚至无症状。

即便感染了高毒力菌株,也并非一定会发展为严重的疾病。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结局,是菌株毒力、人的体质、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。人体的胃酸分泌状态,吸烟、高盐饮食、抗生素滥用等因素,都会影响炎症的进展。

简单来说,只有高毒力的菌株长期定植在体内,再加上人体免疫力差、长期有不良的生活习惯,才会大幅提升患胃癌的风险,而多数感染者终生仅表现为轻微的不适。

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全科副主任医师郭跃武也认为,“见菌必杀”的观念已经过时,并非所有的幽门螺杆菌感染者都需要立刻进行根除治疗,幽门螺杆菌的致癌风险与不同的毒力分型密切相关。低毒力的幽门螺杆菌对胃酸的调节还有一定的作用,有助于减轻胃食管反流的发病率。

以下几类人群尤其需要谨慎“杀菌”——

14岁以下无症状的少年、儿童,感染多为一过性,过度治疗可能会破坏肠道菌群。

80岁以上的健康老人,其治疗获益可能不明显,且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高。

合并严重肝肾衰竭、晚期肿瘤等基础病的患者,其治疗的重点应放在基础疾病上,而非盲目“杀菌”。

多次根除失败且无高危因素者,继续治疗容易加重耐药。

中西结合,优势互补

对于有以下治疗指征的人群,比如消化性溃疡患者,有胃癌家族史者、胃黏膜萎缩或肠化生者,则需选择科学的治疗方案。

目前的主流疗法是铋剂四联疗法,通过抑酸剂、铋剂搭配两种抗生素,幽门螺杆菌的根除率可达85%以上。但需要注意的是,抗生素耐药的问题日益严重,克拉霉素、甲硝唑的耐药率已超50%。进行耐药基因检测,有利于精准用药,提高灭菌的成功率。

一旦根除失败,需遵循“抗生素假期”原则,间隔3到6个月再治疗,优先选用阿莫西林、四环素等低耐药抗生素。

除了西医治疗,中医药在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防治中也有独特的价值。章鸣鸣主任指出,中医虽无“幽门螺

杆菌”的概念,但根据胃痛痞、痞满等症候,可将其归为“湿郁热邪”的范畴,核心病机是“脾胃虚弱、湿郁内蕴”。临床常见有脾胃湿热、脾胃虚弱、寒热错杂等证型,可以分别采用清热化湿、健脾益气、辛开苦降等治法。连朴饮、香砂六君子汤、半夏泻心汤等经典方剂的疗效较为显著。

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幽门螺杆菌能够起到优势互补的作用,中药可以减轻西药带来的不良反应,提升根除率,同时还能修复胃黏膜、调节菌群,降低复发的风险。

对于那些不适合接受根除治疗的人群,可以考虑通过生活中的天然食材进行“食疗”。比如,蜂蛰中的高良姜素、松属素等成分,可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生长,降低其毒力因子活性,减轻胃黏膜炎症。西蓝花嫩芽中的萝卜硫素、蜂蜜中的甲基乙二醛,也能辅助抑制幽门螺杆菌的定植。不

过,这些天然成分只能作为辅助,不能替代药物,仅适合日常调理或联合治疗。

家庭防控是阻断幽门螺杆菌传播的关键。其核心策略是“同查同治、分餐防护、消毒隔离”。家庭成员中若有感染者,家人需同步检测,阳性者需共同治疗,避免交叉感染。日常要严格分餐,使用公筷公勺,餐具煮沸消毒15分钟以上。杜绝口对口喂食,个人物品要专人专用,饭前便后认真洗手。这些看似简单的措施,能有效降低家庭内的传播风险,从源头上控制幽门螺杆菌的感染。

总之,感染幽门螺杆菌,既无须“谈菌色变”,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是否需要治疗,应该请医生评估肿瘤家族史、个人体质、消化道基础疾病、环境因素等,有条件的还可以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毒力检测。遵医嘱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,同时应重视家庭防控,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